

於時空角力： 繪製土坂村傳統地名圖*

蕭鄉唯**

摘要

繪製地圖不僅是描繪真實地理空間，更是建構特定社會文化脈絡認知「真實」的媒介，體現知識與權力的特定樣貌。有別於將地圖及其繪製過程視為理性與科學的成果，Brian Harley 藉由提倡批判地圖學（critical cartography），嘗試跳脫視地圖為中性存有的傳統觀點，指出地圖一方面是權力的產物，另一方面更是生產權力的工具，更反思繪製地圖如何成為少數族群實踐的權力與強化利益的手段。然而，便是因為地圖具有權力生產的能力，圍繞地圖的社會實踐難以避免地圖淪為特定利益與權力間競爭的文本場域，因此本研究嘗試由 Harley（1989）所強調的地圖社會文化面向出發，以大學與排灣社群共同繪製傳統地名圖的案例，進一步反思 Foucault 所強調之「權力的普遍性不在於它的包羅萬象，而是因為它來自於所有地方」如何影響 Harley（1990）所期盼的地圖民主化，並進一步以後表徵地圖學（post-representational

* 本研究特別感謝 vuvu 朱董豐山、vuvu 朱連珠、kama 古明哲等土坂村居民的大力支持，若非諸位無私地分享畢生所學，本篇論文將無法成形。同時，感謝李昀融與張雯喬用心地彙整長輩所分享的智慧，為此研究奠定堅實基礎。本研究由國科會 NSTC113-2420-H-143-003-HS3 計畫支持，特此感謝。

** 國立臺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助理教授，E-mail: hhwei@nttu.edu.tw

cartography) 觀點指出大學面對排灣族的階序與空間之關係時，如何在回應「地圖必須體現社群中特定家族的權力以建構真實」的傳統觀點過程中，於當代脈絡中解構國家與地方的多樣權力衝突，積極建構契合在地社群所認知的多元「真實」地圖。

關鍵詞：排灣族、地圖、社會實踐、批判地圖學、後表徵地圖學

一、前言

「跟啦里吧（部落）還有愛國蒲（部落）不一樣，土坂村很複雜，你們畫地圖要非常小心。」這是當國立臺東大學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中心（簡稱東大人社實踐中心）即將透過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簡稱 GIS）於臺東縣達仁鄉土坂村與在地居民共同繪製地圖時，來自土坂村 Saljingusan 傳統領袖家族長輩的懇切囑咐。然而，同為排灣族群的三個村落（啦里吧、愛國蒲、土坂），土坂村哪裡不一樣？為何複雜？要小心什麼？這些叮嚀，似乎是東大人社實踐中心在土坂村以地圖為媒介驅動社會實踐時，必須思索與面對的課題。

東大人社實踐中心因執行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簡稱國科會）所推動的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於 2019 年底便試圖以「繪製地圖」為方法，嘗試串聯包括政治學、人類學、公共事務管理學，以及土木工程學等背景的計畫參與者，一同探究如何經由關切傳統生態知識、災害防治、里山倡議與永續發展等議題，於大竹高溪流域的排灣族村落驅動社會實踐。GIS 作為一種研究方法與資料呈顯的管道，不僅提供跨學科對話的可能，更有利於藉著學界長期對於臺灣原住民族，特別是排灣族群所奠定的「人地關係」（man-land relationships）研究基礎，進一步打造大學與在地居民之間跨知識系統的對話空間。

地圖的科學與客觀特質成為東大人社實踐中心促進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對話媒介。經由運用全球定位系統（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簡稱 GPS）儀器及衛星地圖二數位工具，搭配場域居民對於自然地景的熟稔，東大人社實踐中心期盼連結在地知識與適當科技（appropriate technology），以 Google Earth 和

Quantum GIS（簡稱 QGIS，是一個開源且免費的 GIS 軟體，用於查看、編輯和分析地理空間數據），嘗試描繪指涉特殊自然環境且邊界明確的傳統地名，並透過現地調查探究不同知識體系的可能對話節點，進而思考兼具在地特殊性與全球普同性面貌的災害防治、里山倡議與永續發展等觀點，何以經由排灣族傳統生態知識實踐於土坂村。儘管 Google Earth 的衛星地圖體現一定程度（部分區塊未即時更新圖資）的真實地景，同為土坂村民（但隸屬不同社群）的在地居民也使用相同名稱指涉某特定空間，然而誠如前文所提之 Saljingusan 傳統領袖家族長輩的叮嚀，東大人社實踐中心確實在土坂村畫地圖的過程中，發現參與繪製地圖的不同行動者對於名稱背後的意義，以及對於與地名緊密相關的傳統領域的範圍有著多元認知。因此，也許與社區共同繪製地圖在某些層面確實可呈顯對於空間的客觀認知，但因建置 GIS 的主觀性與開放性，仍不可忽略製圖過程中所蘊含的矛盾與異質理解，如何在地方社會生產影響社會文化的動能，進而影響以繪製地圖為手段的社會實踐意涵。

二、從批判地圖學到後表徵製圖學

有鑑於此，以 GIS 推動社會實踐時必須考量到，儘管地圖利用符號化（symbolization）及簡括化（generalization）等手段，嘗試從科學及客觀的視角建構有效的資訊傳遞功能，但更應意識到地圖並非單純再現某種僵化的物理範疇，而是在特殊的時空背景與文化脈絡中，動態地重塑與體現多元的主觀認知（Harley, 1989; Orford, 2005; 林怡先, 2012; Sletto et al., 2021）。透過解構地圖，Brian Harley（1989）經由 Jacques Derrida 的修辭學與

Michel Foucault 對於知識與權力的反思提倡批判地圖學（critical cartography），嘗試跳脫視地圖為中性存有的傳統觀點，進一步論證地圖不僅是權力的產物，更是生產權力的工具。Harley（1989）認為早期評判「好」地圖的標準僅著重於其客觀、精確與真實性，但在抽象化、網格化或電子化的坐標地圖背後，事實上隱藏了種族、政治、宗教、社會階層等面向的價值判斷。藉著批判地圖學觀點解構與呈顯社會化的地表面貌，Harley 指出地圖實則蘊含外顯的（external）以及內部的（internal）權力關係，體現地圖製作當下所處的政治、經濟及文化背景，並進一步探究地圖如何影響其使用者所認知的真實。因此，地圖不再僅被視為是真實自然地景的紀錄，更應從社會文化與政治經濟面向剖析地圖如何生產與使用（Claval, 1980），進而反思多重行動者如何於特定脈絡中共同繪製地圖。

若欲剖析製圖過程中伴隨不同脈絡而生的多樣能動性，我們可藉由 Blackmore and Harley（1980）所提出的地圖資訊模型（map communication model, MCM）剖析地圖所串聯的各種元素，將地圖的生成視為「製圖者」從「世界」提煉資訊並符號化後生成「地圖」，並依據特定觀點與知識進行校對與修改，使其創作迥異於客觀世界，並由「讀圖者」於使用地圖的過程中，與被再造的世界對接，進而建構一種對於世界的真實想像。因此就如同 Harley（1989: 13-14）所強調的，地圖本身並非中立與客觀，而是充滿製圖者個人及其所屬社群範疇的價值和判斷，使地圖成為具有權力的沉默仲裁者，製造且形式化與空間相關的知識。若要探索地圖何以成為權力的產物並建構權力，必須加以了解製作與使用地圖的文化脈絡（Wood, 1992; Kitchin and Dodge, 2007）。Harley 的觀點喚起如反製圖（counter-mapping）、民族製圖

(ethnocartography)、社區製圖 (community-based mapping) 與參與式製圖 (participatory mapping) 等社會實踐動能，驅使地圖於民主化、跳脫專業化的過程中正視被遺漏與排除的訊息，避免「地圖寂靜」(map silence) 的危機，從而強化少數群體製經由地圖所實踐的權力與利益。

藉由 Harley 所提倡的批判地圖學，Perkins (2003, 2004, 2008) 進一步對製圖行為本身重新思考，關注製圖過程、製圖機構、社會團體、權力、網絡互動和製圖中情感的運作，以及製圖行為中伴隨著而來的實踐 (practice)。透過重新探索地圖的本體論、認識論與方法論，研究者們提出後表徵觀點 (post-representational perspective)，跳脫將地圖假設為世界的鏡像，延伸並超越 Harley 仍將地圖視為反映特定 (製圖者意識框架所建構) 真實的媒介，嘗試解構地圖的構想、製作和使用方式 (Kitchin, 2010)。後表徵觀點將地圖視為不穩定和複雜的文本，具有將權力分散並嵌入特定脈絡的能動性，生產創造世界的的能力 (Perkins, 2004; Wood and Fels, 2008)。Sletto 等人 (2021: 5) 便透過於厄瓜多、墨西哥、巴西以及委內瑞拉蘇利亞州的四個不同區域原住民族推動走動參與式製圖的經驗為例，指出若以地圖驅動實踐，研究者的視角必須從本體論 (ontology, 指涉事物如何存在) 轉移到本體生成 (ontogenesis, 強調事物如何成為)，並且從 (封閉的) 表徵轉移到 (展開的) 實踐。他們亦進一步提醒，由於原住民認識論深植根於地景故事中，故事所具備的開放性與探索性特質，促使研究者一方面必須將地圖視為本質上不穩定和未完成的，另一方面意識到世界總是在製圖過程中重新折疊和再呈現 (Sletto et al., 2021)。

批判地圖學的思辨，促使當代地圖的產製多半積極避免以地圖為媒介的社會實踐淪為特定利益與權力之產的文本場域，但誠如林怡先（2012：13）所強調，繪製地圖是一種流動的、偶然的，且與脈絡依存的具體實踐。因此必須從後表徵觀點出發，意識到所有製圖行為都是選擇性且具有文化社會脈絡，進而挑戰了企圖藉由地圖民主化抹去權力不均而體現並建構中心的可能性，更難以避免藉由繪製地圖所運轉的社會實踐淪為生產利益與權力的行動。就如同 Corner（1999）所言，地圖一次次地重新製造領土，並持續產生新的、多樣的後果，因此相較於思考地圖代表和意味什麼，更需思考地圖做（do）了什麼。藉由探究地圖本身的能動性，東大人社實踐中心透過刻畫土坂村傳統生態知識而產製的地圖，究竟是科學化地如實記錄空間中被普遍認同的物理特性，為探索具有在地面貌的災害防治、里山倡議與永續發展等議題提供客觀的資料？抑或是在繪製與產出地圖的過程體現多樣的主觀空間認知，並進一步促使地圖建構與強化特定權力關係？

綜上所論，本研究由 Harley（1989）所強調的地圖社會文化面向出發，嘗試剖析將階序體系視為社會文化基礎，強調因不同社會地位而產生特權（privilege）的排灣族社群製圖行動，嘗試反思 Foucault 所強調之「權力的普遍性不在於它的包羅萬象，而是因為它來自於所有地方」如何挑戰 Harley（1990）期盼地圖民主化的可能性，並進一步以後表徵製圖觀點，探討大學在面對排灣族的階序與空間之關係時，如何在回應「地圖必須體現社群中特定地位的特權以建構真實」的在地觀點過程中，兼顧多重行動者（包含不同在地社群、個人，以及東大人社實踐中心）嘗試於當代脈絡中建構與解構多樣權力衝突，積極建構契合在地社群所認知的「真實」地圖。藉由洞悉排灣族社會文化解析人地關係，

本文將分別藉由探究「土坂村哪裡不一樣？為何複雜？要小心什麼？」等三個問題，理解多元能動性如何影響製圖過程，並聚焦於東大人社實踐中心如何依循在地文化脈絡擬定適合的行動方法，透過繪製傳統地名圖驅動社會實踐。

三、研究架構

本研究將以東大人社實踐中心在土坂村製作地圖的過程為例，嘗試比較三個不同排灣社群的繪製地圖行動，探究如何以批判地圖學為基礎，進一步將後表徵製圖學理論應用於社會實踐，並經由解構動態且充滿異質性的社群關係，反思以繪製地圖為核心的實踐行動在不同脈絡中社會關係的差異、複雜性，以及需謹慎處理的面向。批判地圖學揭示地圖作為權力工具的本質，並透過解構地圖的製作過程，突顯其背後隱含的社會、政治和經濟價值判斷，進而提出地圖不僅是描繪地理事實的工具，更是權力和利益的載體，並強調製圖者的主觀意識會影響地圖的呈現和使用。後表徵製圖學跳脫將繪製地圖視為科學與客觀成果的視角，進一步探討地圖的能動性，認為地圖不僅反映現實，還參與創造和形塑現實，藉此強調地圖的動態性和不穩定性，反思地圖製作和使用過程中如何促進權力與社會互動。

奠基於上述理論脈絡，本文將藉由闡述與東大人社實踐中心共同繪製地圖的不同部落（如啦里吧、愛國蒲、土坂）在地理位置、歷史、宗教信仰和社會階序的差異，思索若欲以地圖呈現兼具神聖性與階序性，以及與空間相關的在地知識時，應如何處理不同領袖家族的利益和權力關係，並於地圖之上同時體現各家族對於土地和祭儀的不同詮釋和認知，進而一方面驅使傳統文化得

以永續實踐，另一方面描繪傳統生態知識、災害治理以及里山倡議的在地輪廓。即是，在製作地圖時不僅需小心處理各傳統領袖家族對於傳統地名和領域的記憶和詮釋差異，更應積極兼顧並促進各家族的傳統和當代需求，通過多方交涉和協商，確保地圖的製作能夠在不同情境中取得平衡。

綜上所論，本研究將舉例說明不同行動者間如何經由多重視角動態協商，使地圖成為社會實踐的重要工具，並在記錄自然地景的同時，反映不同社群內部與彼此之間的權力和社會互動。我們即將看見在土坂村的地圖製作行動中，空間的階序性與神聖性如何使各社群產生競合關係，以及東大人社實踐中心如何在積極趨近在地多重權力關係的過程中，以數位媒介囊括多重視角的協作方式，遊走在不同社群間的矛盾之中，嘗試避免繪製地圖的衝突；且透過既競爭又合作的社群關係牽引參與者一同協作，使地圖成為不同知識系統和權力結構對話的平台，嘗試促進社會權力結構的重塑和再現。藉由土坂村繪製地圖的社會實踐案例，本文試圖指出地圖不僅是一個靜態的記錄工具，更在地理資訊不斷更新和協商的過程中，一方面成為編織在地社會關係的管道，另一方面形塑包容動態性與多樣性的社會實踐平台。

四、哪裡不一樣？

雖然土坂村與愛國蒲部落（隸屬大竹村）和啦里吧部落（隸屬台坂村）皆為以排灣文化為主體的社群組織，但隨居住空間和宗教信仰的轉變及延續，與二者緊密扣連的階序體系於各村落以不同形式存有，促使繪製地圖的行動於各村落產生多樣張力。就居住空間而論，部落組織於國家治理的地方化過程中，各社群受

集團移住政策影響，迫使本以單一傳統領袖家族為核心的部落集結為村（例如愛國蒲、工作地、大竹本部落、富山、富南，以及加津林等六個部落組成大竹村行政區；啦里吧、佳阿烏、加發哪額、加滿額斯等四部落組成台坂村行政區；而土坂村則是由來自大谷、古樓、舊土坂，以及八里芬愛等四個部落的族人所組成），導致隸屬不同部落的傳統領袖家族必須於新的空間範疇中重新界定彼此的關係。然而，愛國蒲部落、啦里吧部落與土坂村的差別在於，前二者雖與其他部落一同被劃定為某行政村的一員，其居住空間（見圖 1 與圖 2）仍有一定程度的獨立性，並維持於既有的傳統領域範疇內，使其部落的公共事務仍可以單一傳統領袖為核心運行。然而，同樣是在國家治理的框架中被重劃空間，土坂村內來自不同部落的居民則比鄰而居（見圖 3），進而迫使在推動如五年祭與小米收穫祭等與空間緊密結合的傳統公共事務過程中，土坂村內各部落間產生既合作又競爭的微妙關係。



圖 1 愛國蒲部落與大竹村其他部落之空間關係（筆者以 Google Earth 繪製）



圖 2 啦里吧部落與台坂村其他部落之空間關係（筆者以 Google Earth 繪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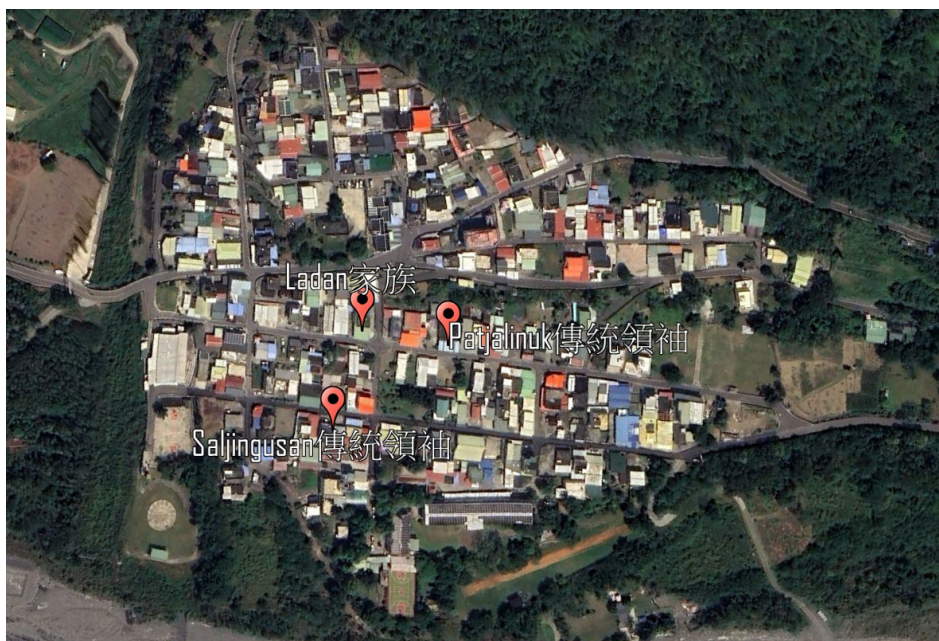


圖 3 土坂村各家族分布空間關係（筆者以 Google Earth 繪製）

從宗教信仰的面向觀之，祭儀可謂是排灣部落極為重要的公共事務，但受基督宗教的影響，即便愛國蒲部落與啦里吧部落仍以傳統領袖為部落祭儀的主體，在地居民往往將感恩節視為比收穫祭更重要的活動，進而影響傳統領袖於當代所扮演的角色。此外，受土地私有化政策的影響，多數傳統領袖已逐漸喪失儀式中收取納貢（kisaŋja）的權力，以至於當代部落舉辦祭儀一方面需仰賴傳統領袖自主準備如小米、餐食與酒水等儀式用品，另一方面更需借助國家治理的機制，仰賴村長、部落主席等地方幹部向公部門申請經費與豬隻補助，間接地削弱了傳統領袖於儀式中的主動性。以 COVID-19 最嚴峻的期間（2020 年至 2022 年）為例，即便部分傳統領袖仍堅持舉行小米收穫祭，但有些村長因顧慮部落防疫規範，於確保村民健康的前提下拒絕協助傳統領袖向公部門申請補助，進而影響祭儀辦理，可見排灣族階序體系與當代國家治理所形塑的部落多重公共性，既協助卻又阻礙傳統儀式的當代實踐。此外，由部落轉化為村莊的過程中，空間的共享進一步挑戰信仰實踐與階序認知。以土坂村灌溉小米的聖水壇（qaqumu）為例，該祭壇因由岩壁中滲出，提供清澈泉水的自然地景特殊性而設立，為居住於土坂村範圍的族人提供安全且距離不遠的水源；同時此空間地因儀式的神聖性被劃歸為禁忌地，限制族人開墾與住居，藉此避免於含水較多導致土壤沉重的區域活動，減少可能造成的土石滑動危險。然而，對於該由誰、於何時、去何處代表族人進行祭祀……這些連結生活空間與社會階序的問題，各家族有著不同詮釋。

相較於已皈依基督宗教的愛國蒲部落與啦里吧部落，傳統祭儀是土坂村民極為重視的區塊。該社群與空間的連結，從過去到當代仍被認為須透過傳統領袖持續展演祭儀而維持。每年 7 月 15

日以 Patjalinuk（源自大谷部落與舊土坂部落）、Saljingsan（源自八里芬愛部落）、Ladan（源自舊古樓部落）等家族為核心的各社群，長年分別於該日的早（Patjalinuk）、中（Saljingsan）、晚（Ladan）等時段各自舉辦小米收穫祭。各家族領袖雖會相互出席彼此的儀式以表尊重，但仍會私下評論其他家族舉辦祭儀的正當性（例如當某家族於儀式中鳴槍，另一家族會批評不該有以此宣示為領域所有人的舉動）。同樣的，每五年的 10 月 25 日為土坂村舉辦五年祭的重要日子。五年祭的持續展演為土坂村民的共同驕傲。根據部落耆老的說法，日治時期為破除迷信、弱化部落主體性，殖民者強制禁止多數排灣部落辦理五年祭；然而一方面因殖民政府為避免與勢力強大的 Patjalinuk 宗族產生衝突，另一方面因 Patjalinuk 與殖民政府關係良好，在以保存民族研究素材為由的情況下，殖民政府特許土坂村持續展演祭儀。為辦理五年祭，各家族須前往特定的祭祀空間（部落邊界）進行遮蔽，以確保儀式順利進行。然而，因生活空間交疊而產生的共享邊界，造成儀式執行者移除其他家族所設立的結界，並另行遮蔽的行為，導致各家族雖在 10 月 25 日於相同祭場舉行儀式，彼此卻在準備儀式的過程中產生矛盾。

階級體系、居住空間與宗教信仰的相互交織，使得土坂村具有神聖性與階序性的人地關係充滿張力。東大人社實踐中心欲觸及與土地相連的傳統生態知識，並累積可探討在地災害防治與里山倡議的相關素材時，必須先釐清該以何種視角推動與空間及階序相連的地圖繪製行動。即便「傳統領域」是當代國家治理的脈絡中理解原住民族與土地之關係最直接的詞彙，且與排灣社會文化緊密扣連，但東大人社實踐中心選擇以「傳統地名」而非「傳統領域」為主軸繪製地圖，其原因為排灣族社群對於土地所承載

的知識可略分為兩類：「地形地貌」與「歷史事件」。傳統地名較著重於客觀的地形地貌，以突顯地質特性、表層植被以及特殊自然地景等要素，同時包含記述居民們如何取用自然資源（如採集薯榔，或是洗滌紅藜），以及曾發生的特殊歷史事件（包含神話中的屠龍處，以及近代公車翻覆處）等共同生活於特定空間的記憶；而傳統領域較偏向以傳統領袖家族為主體所建構的主觀歷史詮釋，尤其是受遷村移居、結婚嫁娶或戰爭結盟等事件所持續重塑的空間認知。二者間的差異，使得傳統領域的建構往往會成為各家族宣稱權力的依據，而傳統地名則可深化對於傳統生態知識的理解。然而，儘管有著些許差異，在地視角所繪製的地圖難免囊括二者，進而產生人地關係與權力義務的詮釋爭議，迫使社會實踐涉及在地祭儀與知識實踐的內部矛盾。

五、為何複雜？

東大人社實踐中心一方面以「傳統地名」的詞彙為出發點，嘗試由普遍共享的記憶為基礎化解可能引發的內部衝突，另一方面肯認「部落的土地由傳統領袖管理」的在地思維，東大人社實踐中心於正式繪製以傳統地名為主軸的地圖前，積極取得不同領袖家族的理解與首肯，藉此將行動置於排灣族社會文化脈絡，平衡各家族於地圖中的權力。同時，部落當代異質的公共性也驅使東大人社實踐中心尋求身兼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與部落會議主席熊大龍的協助，期盼能跳出過往以傳統領袖為基礎的空間範疇，疊加上具現代公共議題的村莊色彩，企圖滿足與轉化在地對於公共的不同理解。此外，對東大人社實踐中心而言，繪製傳統地名圖除了促進在地知識與學術觀點間的對話、描繪傳統生態知識、災

害防治、里山倡議與永續發展等議題的在地面貌，更期盼透過建構可閱讀的文本及其生產過程，強化在地居民所重視的文化傳承動能，進一步探索與形塑人地關係的當代途徑。除了企圖囊括各傳統領袖家族、部落會議與社區發展協會等關切不同公共面貌的參與者之外，東大人社實踐中心也邀請就讀國立臺東大學南島文化研究碩士班，同時也是土坂村 Patjalinuk 傳統領袖家族的後代包辰芸參與其中，請她協助號召在地青年參與繪製地圖，藉此將社會實踐的動能擴及地方年輕世代。即是，為回應 John Briggs (2013) 所強調的「在地知識建構方法」(indigenous ways of knowing)，並從實踐展開的面向思索地圖如何作動 (Corner, 1999)，東大人社實踐中心嘗試梳理土坂村知識與權力的關係，並積極依循排灣族人知識建構的慣習，以創新媒介於動態脈絡中趨近在地知識建構方法，於正當化行動方案的同時，脈絡化地圖所承載的傳統與當代面向。

有關「部落的土地由傳統領袖管理」一說，根據部落耆老口述，過去每到春耕啟動之際，傳統領袖便會依據輪耕的慣習，至當前即將開墾之區域設立祭壇進行標記，並由部落族人獲得領袖同意後參與耕作，以確保其餘土地得到足夠的休息。即便當代族人生計活動已不以農業為主，土坂村傳統領袖仍持續展演如開墾、播種與疏苗等繁複的小米祭儀。祭典中使用族人種植的小米，搭配執行 kusatja 儀式向各戶收取的飲料、根莖類作物與現金，以及透過村長向鄉公所申請的豬隻，積極地維繫由小米收穫祭所體現的人地關係。

當東大人社實踐中心嘗試觸碰具有神聖性與階序性的知識體系時，繪製地圖的重點便不只是確保內容的正確性，更要妥善處理製圖方法如何滿足 kakudan (排灣族語對於「文化」的直譯，

但其語境多圍繞於階序互動，指涉特定身分的權利義務)的規範，避免與空間相連的知識詮釋、建構與使用脫離既有脈絡。因此，於啟動繪製地圖的行動前，東大人社實踐中心嘗試便逐一拜訪土坂村三家傳統領袖，嘗試獲得家族的支持與祖靈的認可，賦予GIS在地文化意涵。

「如何啟動製圖？」成為發展行動的首要課題。儘管東大人社實踐中心已邀請隸屬在地不同社群的協力者參與計畫運作，但有鑑於傳統與當代多重公共性所產生的張力，且籌備地圖繪製行動的當下正逢2022年中華民國地方公職人員選舉（俗稱九合一選舉），過程中需透過適當的窗口與傳統領袖請益，避免將大學推動社會實踐時所號召的人群染上政治色彩，引發可能的猜疑與衝突。此外，即便各家族皆重視社會階序與傳統祭儀的傳承，不同行動者對於如何掌握奠基於土地的知識之角力，以及各家族所面臨的當代困境情勢，難免導致各社群對於東大所提議的繪製地圖一事有著多樣理解。因此，相較於人類學田野調查講求深入地參與地方事務的傳統研究方法，於推動社會實踐的過程中，東大人社實踐中心轉以親密卻又保持距離的立場，於理解與尊重地方社會文化特殊性的同時，突顯身為局外人（地方大學／外部團體）的身分，並適時地透過各家族因對社會階序重視而產生的競爭關係，謹慎驅動繪製地圖所涉及的神聖性與階序性在地知識。

「是否與東大人社實踐中心合作？」各家族內部有著不同聲音。為避免深化其內部的矛盾，交涉行動必須熱切但不催促，於妥善拿捏人地關係以及三家傳統領袖間矛盾的同時，應考量各家族的內部差異，避免使行動成為撕裂關係的源頭。由於在地知識的神聖性與階序性，以及各家傳統領袖間既合作又競爭的矛盾關係，「交涉發生的空間」需顧及社會文化脈絡。雖然以外部團體

之姿推動社會實踐，可於村辦公處或社區發展協會辦公室等相對中性的空間中，與各家族「同時」商議繪製地圖的方法與其可能的產出模式，但一方面為避免於共同協商的過程中引發家族間的爭論，而另一方面為突顯對於階序制度與傳統信仰之重視，東大人社實踐中心選擇逐一前往各家族祖靈屋與傳統領袖家戶進行互動。然而，拜訪的順序若由東大人社實踐中心規劃，將可能因先後次序產生「某家族比較重要、具主導地位」等不必要的誤會。因此東大人社實踐中心分別透過各家族成員請示傳統領袖適合拜訪的時間點，以「配合各家族時間」的被動立場，避免觸及順序安排的困難抉擇。

東大人社實踐中心與各傳統領袖家族的聯絡人包含包辰芸、畢業於國立臺東大學文化資源與休閒產業研究所的黃國偉，以及已於其他場域共同推動社會實踐的協力者，且隸屬傳統領袖家族家臣的古明哲等三人，藉著其所具備的親屬關係分別協助與 Patjalinuk（包辰芸）、Ladan（黃國偉）和 Saljingusan（古明哲）等家族進行初步聯絡。在向 Patjalinuk 家族提議的過程中，由於該家族許多成員皆曾於東大修業，並有部分成員仍活躍於學術體系，因此很快地便理解且答應東大人社實踐中心的拜訪之請。透過與愛國蒲部落耆老與啦里吧部落耆老所製作的傳統地名圖為基礎，東大人社實踐中除了以「Google Earth 衛星地圖」套疊「臺灣百年歷史地圖」製作簡報，展現 GIS 的便利性與可塑性，闡述如何以地圖強化當代對於過往居住空間的認識，以及文化傳承與實踐等目的外，更經由於 2019 年跟隨 Patjalinuk 家族前往舊部落尋根之照片與衛星定位資料，嘗試於數位媒介之中呈現該家族與土地的互動，以更具可近性（accessibility）的資訊開啟對話的空間。Patjalinuk 當家領袖包嘉鴻很快地便同意參與地圖繪製的工

作，並囑咐包辰芸應尋求家族耆老朱董豐山協助，盡速將逐漸被淡忘的重要記憶刻畫於地圖之上。

由黃國偉協助安排交涉的 Ladan 家族，1939 年因舊古樓部落人口過多，在日本殖民政府的建議下，由其祖先 Sa Camak 開始尋覓新的居住地。Sa Camak 分別走訪丹林、鵝鑾鼻、大竹等區域後，最終決定率領族人陸續搬遷至與其有親屬關係的 Patjalinuk 家族所屬領地，並在 1940 年左右短暫居於東高社，1953 年後搬遷至土坂村現址。Ladan 家族目前由陳美花接任第 13 代傳統領袖。東大人社實踐中心與 Ladan 家族交涉因以餐敘模式辦理，互動過程中僅能以口頭說明繪製地圖的方式，並由身為 Ladan 家臣的熊大龍協助傳達建構在地知識的目標，期盼雙方可藉由共同關注文化傳承而達成協作共識。

然而，相較於透過繪製地圖強化與土地的連結，Ladan 家族表示其家族現階段正以其所成立的「社團法人臺東縣 Ladan 文化永續發展協會」建構家臣名冊，積極鞏固階序制度的運作。根據部落居民的說法，Ladan 家族因其近代的發展歷史僅擁有相對短暫的居住時間，受限於排灣族群對於先佔權的論述而偏向不強調人地關係的階序性。在此必須強調，Ladan 家族並非忽視由祭儀與土地連動所生成的階序互動。遷徙至今的 80 餘年，Ladan 家族已與其他原居者共享由使用土地所衍伸的祭祀文化，並藉由延續早已於舊古樓部落便開始實踐的各類祭儀，參與空間神聖性的論述與實踐。透過致力於家臣名冊的建構，Ladan 家族一方面藉由形塑完整的家臣體系，另一方面透過祭儀實踐強化其傳統領袖於階序制度中的核心位置。雖然交涉過程並未與 Ladan 家族達成共同繪製地圖的共識，但東大人社實踐中心預計於未來經由描繪其遷居舊址（東高社）中各家戶以及職責的過程中，體現 Ladan 家族與此空間的連結。

與 Patjalinuk 與 Ladan 家族交涉的同時，東大人社實踐中心也積極尋求與 Saljingusan 家族請益的機會。根據古明哲的說法，土坂村 Saljingusan 家族祖先由屏東 Puljetji（舊嘉興部落）遷居至東部，為土坂村當前範圍內最早居住於此一領域的家族，然而其祖先因受瘟疫、外族以及殖民者的侵擾而散居他處，導致當代成員探尋凝聚與重振家族的途徑更為艱辛。有鑑於當下 Saljingusan 家族年輕人正與東大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畢業生邱建維合作，正緊鑼密鼓地透過日治時期戶口調查簿建構族譜，並於祭儀實踐的過程中更具體地重新連結分散於各村的家族成員；因此經與古明哲和與邱建維商議後，決定暫時不擾動正逐步穩固的家族動能。由於東大人社實踐中心自 2019 年計畫開始，便以不同形式的互動與 Saljingusan 家族保持關係，儘管以繪製傳統地名圖行動為媒介與開端的社會實踐行動無法立即囊括 Saljingusan 家族的參與，後續對於傳統生態知識、災害防治、里山倡議與永續發展等議題的討論過程，東大人社實踐中心除了透過古明哲把關地圖資訊是否貼近其家族認知外，更將持續探詢邀請 Saljingusan 家族參與的可能，以確保不同社群於地方議題論述過程中的話語權。

經過繁複的事前交涉，僅有 Patjalinuk 傳統領袖確切表明其家族將參與地圖繪製，並由其家族耆老朱董豐山與東大人社實踐中心一同透過 GIS 繪製傳統地名圖。生於 1950 年，現年 73 歲的朱董豐山是 Patjalinuk 傳統領袖家族前女巫師長之子，出生於大谷部落的他曾擔任土坂村村幹事以及土地審查委員，因此熟知部落重要事務發生的年代與狀況、各家族婚配關係以及各區域傳統地名，是當代諸多研究工作者必定拜訪的重要人物。根據朱董豐山的說法，他為執行公務與家族事務曾走遍當代認知中的土坂村周邊土地四十餘次，並留下諸多手繪地圖（圖 4）與故事筆記。與朱董豐山共同繪製地圖的過程，可發現年事已高的他仍可

清楚道出土地編號、闡述居民們錯綜複雜的社會關係，以及事件發生的日期、時間。然而，為了在當地領袖家族有限參與的情況下，確保繪製地圖的過程仍維持某種程度的中立性，東大人社實踐中心透過發送公文，向達仁鄉公所借調族語推廣人員，且同為 Saljingusan 家族成員的古明哲參與其中，一方面協助校正傳統地名的羅馬拼音，另一方面藉此確保不同的視角參與繪製地圖的過程。同時，由於朱董豐山的夫人朱連珠來自 Tjakisuvung 家族，為 Ladan 家族由舊古樓部落遷往東高社後的重要成員，東大人社實踐中心也邀請朱連珠一同參與地圖繪製，希望在既有的合作關係中盡可能納入 Ladan 家族的視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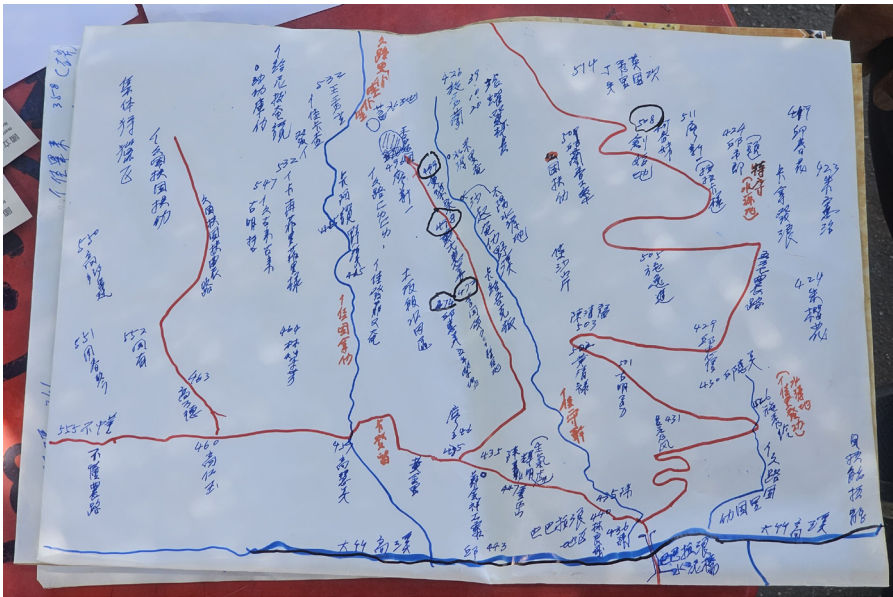


圖 4 朱董豐山手繪地圖（筆者拍攝於 2023 年 7 月 9 日）

除了藉由不同名義，邀請各社群部分關鍵成員參與繪製地圖，東大人社實踐中心也透過規劃工作坊的辦理地點，盡可能於

多重公共性脈絡中提升各家族參與活動的可能。由於繪圖工作觸及具有階序性與神聖性的在地知識，執行工作坊的地點僅有一次選定於 Patjalinuk 傳統領袖家屋，由包辰芸代表東大人社實踐中心與 Patjalinuk 家族於祖靈屋以米酒進行 pilisi（祭祀），向祖靈告知繪製地圖行動的目標與過程，並尋求可能發生錯誤的諒解，促使社會實踐進入地方「傳統公共事務」的脈絡之中。然而，後續的工作坊則轉至村辦公處與社區發展協會辦公室等地舉辦，期盼以「當代公共事務」的展演空間為主軸，避免行動成為單一家族事務。

土坂村辦公處因設有液晶電視以及大幅的村落地圖，加上其所具備的開放特質，成為繪製地圖的主要地點。初期參與繪製地圖工作坊的在地居民除了朱董豐山、朱連珠、古明哲、包辰芸之外，還有身兼 Patjalinuk 家族巫師的呂美惠與林秀蘭（前者為達仁鄉公所秘書，後者為土坂 vusam 文化實驗小學教師）等人。就東大人社實踐中心的立場而論，與場域居民共同藉由產出 GIS 地圖是為探究如何以在地知識的傳統與當代面向，探索在地面貌的里山倡議，進而建構契合排灣文化的永續發展方針。從在地居民視角出發，參與繪製傳統地名圖不僅是為探索過去祖先與空間經長年互動後所積累的知識，更是為確認未來實踐祭儀的正確地點。因此除了記錄遷村歷史、神話故事以及特殊地形地貌之外，繪製傳統地名地圖更著重於理解在地不同社群、如何呈現特定認知中的社會文化慣習與準則、經由繪圖過程中強化與自然和人文地景之連結。在繪製地圖的過程中可以發現，地名所承載的知識不僅可追溯百年前的過去，更進一步體現近四、五十年族人的生活如何與空間的轉變產生相互影響。例如在過去，族人離開部落上山工作之前，會在部落出入口進行鳥占（於特定的地點聆聽特定鳥類的叫聲，判斷當下是否適合外出），而此一慣習隨著鄉道

開通以及柏油路的鋪設，不僅改變族人對於出入口的認知，更促使鳥占的地點被重新設置。時間與空間相互交錯的動態性，使繪製地圖的行動不僅是記錄靜態的祭壇位置，更嘗試於動態的時空中，避免隨著耆老凋零導致重要的祭祀地點被遺忘，進而影響具有階序性與神聖性的祭儀實踐。

歷經幾次地圖繪製工作坊的過程中，除了部分行經村辦公處的居民受人群吸引而駐足聆聽朱董豐山訴說故事外，先前未正式接洽的 Saljingusan 宗家領袖與男祭司（parakaliay）古明勇二人也應古明哲之邀前來參與討論。根據古明哲的說法，朱董豐山確實掌握龐大的土坂村文史知識，然而其所屬之 Patjalinuk 家族主要的活動範圍在大谷與舊土坂，芬阿參區域的相關故事應由其領域所有者 Saljingusan 宗家領袖闡述。增加繪製地圖參與者異質性的情境下，一方面確實觸發長者們長久以來與土地互動的記憶，熱烈地透過 Google Earth 所呈現的空間討論與確認每塊區域的名稱，並回憶各自所知發生於該處的故事；但另一方面在地參與者為了避免因不同認知而產生衝突，似乎也刻意不提及特定事件，以至於限縮了內容的深度。以排灣族常見的「紅眼睛巴里」之土坂版本為例，當 Patjalinuk 家族成員與 Saljingusan 家族成員同時在場時，雙方只共同指出該神話故事發生的地點名稱為 Tjapalji（Tja：該處有，palji：巴里）；然而當僅有 Patjalinuk 家族成員在場時，該故事的內容則被進一步補充如下：

從前有一位名叫 Palji 具有紅眼睛的孩童，於此處與族人隔離，但因族人害怕被其力量殺害，便請 Seqalu 族人（指當時居住於大竹高溪下游右岸者，應為卑南族人）派一百位年輕人來殺 Palji。當時已使用石頭將其砸死，不料一段時間沒動靜後再將石頭搬開，卻發現 Palji 的

眼睛還能夠開闔，於是當場就死了九十九個 Seqalu 的年輕人，剩下的一人因休息去上廁所才沒被殺死，並將此事件傳達給其他 Seqalu 族人。因 Palji 殺了九十九位 Seqalu 人民，所以居住於土坂的排灣族人後續便需要向 Seqalu 族繳納貢品以示賠償。本該由 Saljingusan 家族負責繳納貢品，但因其歷經瘟疫侵擾後無力持續執行進貢，而將竹籃（收貢權）、銅鈴（五年祭祭祀權）與石板（土地所有權）等信物讓渡給與卑南族有姻親關係的 Patjalinuk 家族，由其代為至 Puljaviqan（地名）向 Seqalu 族繳納貢品（一百個小米糕、十甕小米酒與一頭豬）。

反之，只有 Saljingusan 家族成員出席時，「紅眼睛巴里」的內容則為：

Cumai（Saljingusan 家族開基祖 Ljakuang 之次子）在結婚時還沒有 Palji 的能力，當孩子出生幾年後才逐漸獲得了 Palji（用眼睛看會殺死生物）的能力，一開始只是用眼睛看了蒼蠅會死掉，部落的人得知後便告訴傳統領袖，傳統領袖帶他去河裡看魚，魚便死掉。為了族人的安全，便將他移到 Tjapalji 居住。每日他的孩子們來送飯時，會先呼喊告知他，讓他戴上銅片製作的帽子遮住眼睛。某日，他實在太想念他的兩個孩子了，想要看一下他們，便不小心拿下了帽子，其中一個孩子便因為 Palji 的注視而死亡，剩下的另一個孩子奔走回部落告訴他們的母親。為了避免 Palji 的能力再傷人，在地族人決定請大竹高溪右岸的一百個 Seqalu 族人來把 Palji 殺掉。

原本 Palji 已經被 Seqalu 砍下了頭顱埋在石堆中，過了一段時間後當其中一人去 Pinaljese kuiyan 上廁所時，其餘的九十九人嘗試把石頭搬開看 Palji 是不是已經死亡，結果搬開時 Palji 的眼睛竟然還在轉動，當他的眼睛看過四周後，這九十九個 Seqalu 的人便死亡了，剩下的那一人則被 Palji 的眼睛傷到了屁股，趕緊奔回部落告訴其他族人。後續 Seqalu 族人因該事件要求 Salingusan 族人每年須繳納貢品。

二則故事針對因 Palji 與 Seqalu 族人而起的衝突之描述並無差異，但土地所有權延伸的神聖性與階序性，以及當在地族人視過去為當代基礎的情境下，Patjalinuk 視角強調過去 Salingusan 如何讓渡收貢權、五年祭祭祀土地所有權，使 Patjalinuk 經由掌握神聖性（銅鈴／五年祭祭祀權）與階序性（竹籃／收貢權），成為當代土坂村土地（石板／傳統領域）的所有者。然而 Salingusan 家族則著墨於 Palji 的神力如何影響族人生活，及其祖先為保護部落所採取的措施與面臨的危機。當代各家族間的角力，是經由對過去的追憶與展演而建構與確立，並透過持續傳述以維持並正當化當代和未來的祭儀實踐，進而影響眾人（包括在地族人、研究者以及觀光客）對於土坂村各家族間的階序關係。神話傳說經世代口述以及報導人的親身經歷（朱董豐山於 1968 年間曾參與納貢），已成為特定社群認知中的真實事件。即是，無論各家族針對同一傳說的訴說為何，其長者所灌輸與告誡的內容已成為特定認知中的「真實」。因此當東大人社實踐中心企圖以 GIS 為媒介刻畫「土坂村」的人地關係，繪製地圖的過程必須積極地編織多樣視角，以不同立場眼中的「虛假」建構充滿異質性的土坂村多重「真實」輪廓，同時透過數位化所賦予的更多

元選擇權，適時地呈現，甚至屏蔽爭議性資訊。相較於批判地圖學為避免地圖寂靜而主張資訊的完整性、嘗試趨近權力對等的理想，反倒在經由後表徵的製圖觀點推動土坂村的製圖行動中可發現，數位媒介所提供的彈性在空間多重公共性的脈絡中，不僅體現權力無所不在的現實，更彰顯（數位）地圖更多元的動能如何影響社會關係。

六、小心什麼？

儘管土坂村各家族對於空間所承載的記憶與詮釋有些許差異，但透過 GIS「追溯祖先足跡、傳承族群文化、延續祭儀實踐」等來自內部與外部行動者的共同意圖（intention），使繪製傳統地名圖一方面成為當代排灣族群，甚至整個臺灣原住民族，以及與地方社會協作的學術單位用以回應國家治理所導致的人地關係疏離所採取的手段之一，另一方面編織與體現不同行動者對於時空的刻畫與認知。因此，即便各家族對於傳統領域的記憶有異，並試圖透過繪製地圖競爭與確立其祖先如何於先佔權的脈絡中占有土地，但傳統地名所描繪的人地關係仍屬於此空間中居民所共享的在地知識。以 Kudangas 區域為例，長輩指出 1960 年代若要結婚，必須先到 Kudangas 採集周邊盛產的黃藤（製作家具）、金線蓮（中藥）、薯榔（染料）等物變賣給收購者，使部落居民得以參與貨幣經濟。藉由回憶過去背負沉重的作物下山販售的情境，來自不同家族的長者們笑著訴說辛苦往事，也感嘆現在已沒體力再次走訪這些充滿回憶的地點，並表示因塑膠與化學染劑日漸普及，已取代在地居民生活中的許多用品，而大武山自然保留區設立後，也限制了民眾對於自然資源的取用。儘管排灣族階序

體系經國家治理的集團移住影響，造成來自不同部落的家族必須共享以行政區為基底的土坂村空間，產生難以化解的糾紛，然而貨幣經濟導入與生計活動轉變，也使屬於不同家族的土坂村民必須共同面對傳統知識與文化崩解的課題。

國科會的人社實踐計畫，講求計畫執行單位應理解地方主體性並掌握在地脈絡，由下而上地發展具有開放性的行動方案，於共作過程中吸納多樣、異質的群體的同時，回歸於在地社會的歷史、結構特殊性等，並透過實作與學術反思，重新想像可行的論述與實踐模式，進而編織地方社群，創造具有彈性的在地行動網絡，凝聚社區動能（陳東升，2013；周睦怡等，2018；周睦怡、陳東升，2019）。基於此論述之上，繪製傳統地名圖須解構排灣社群對於空間與時間的認知，並回歸在地傳統與當代階序體系的特殊性，嘗試於共同行動過程編織異質群體，進而由地圖為媒介促進多元（社群、學科、知識體系）交流。即便傳統地名圖看似聚焦在空間探索，然而因長輩們記憶與口述中的「如何與空間互動」往往隨政治經濟變遷而持續轉動，導致繪製地圖難免涉及時間脈絡中的傳統領域爭議。

在集結 Patjalinuk（大谷與舊土坂）、Saljingusan（八里芬愛）、Ladan（古樓）等三家族的居住空間中，在地居民參與繪製地圖、建構族譜以及辦理巫師祭儀課程等事務，往往是為重建契合階序性與神聖性的人地關係，進而鞏固與祖居地的連結、編織盤根錯節的親屬關係、建構當代復振傳統祭儀的管道，企圖於多樣的空間尺度與時間面向突顯該社群所具備的先佔權（precedence）（Fox, 1994, 2004; Lewis, 2006, 2016; Acciaiol, 2009; Forth, 2009）。排灣族群強調以親屬關係形塑家屋連結，以

及搬遷順序所建構的先居概念，促使傳統領袖在當代經由繪製族譜與地圖建構土地所有權，確立奠基於土地的祭祀權，藉此維繫具神聖性與階序性的社會互動模式。由族譜與地圖所譜出的先佔權論述與實踐，不僅是透過建構時間與空間的理解而強化傳統領袖家屋，以及部落中與其相關的各家族所佔據的土地之連結，對於「居先性」和「所有權」的聲稱更是一種對權力（power）的要求（Clifford, 2013: 13-15）。地圖中蘊含的權力關係，使東大人社實踐中心不但試圖以局內人的視角出發，理解繪製地圖行動可能產生的矛盾，更希望借助局外人的身分，一方面以學術討論、文化傳承為號召調和各家族間的角力，另一方面借助彼此的競合關係，促進各家族參與實作行動，並嘗試以「村」為主體，運用相對客觀且共享的人地關係，建構契合當代脈絡的地圖及其用途。

於排灣社群中繪製地圖所累積的資訊，以及過程所觸發的權力關係，體現出南島語族對於起源與資源的高度重視，而且對於起源有多種不同的認知（Fox, 1994）。經由繪製傳統地名圖將空間與時間進行更細緻的剖析後，比對 Patjalinuk 家族原居地（大谷部落與舊土坂部落，見圖 5）與 Saljingusan 家族原居地（八里芬愛部落，圖 6），可以發現當居住與活動空間有所區隔時，掌管各空間的領袖並無直接的競爭關係，且尚未透過空間與時間的詮釋論證彼此的從屬關係。然而當部落受殖民者所迫集結為村（圖 7），使空間的重疊觸發時間（先佔權）的競逐，進而解構與重構奠基於土地的階序性與神聖性，並且在受國家治理而流逝土地所有權的情境下，在地行動者嘗試與東大人社實踐中心攜手於當代以 GIS 為媒介，以「數位」管道一方面重新強化與土地的連結，另一方面突顯空間中的時間脈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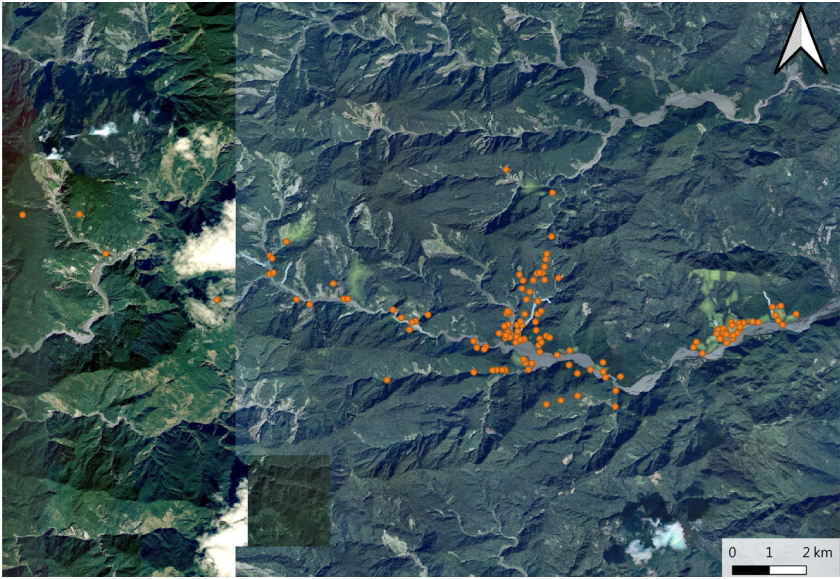


圖 5 大谷部落與舊土坂部落（李昀融以 QGIS 繪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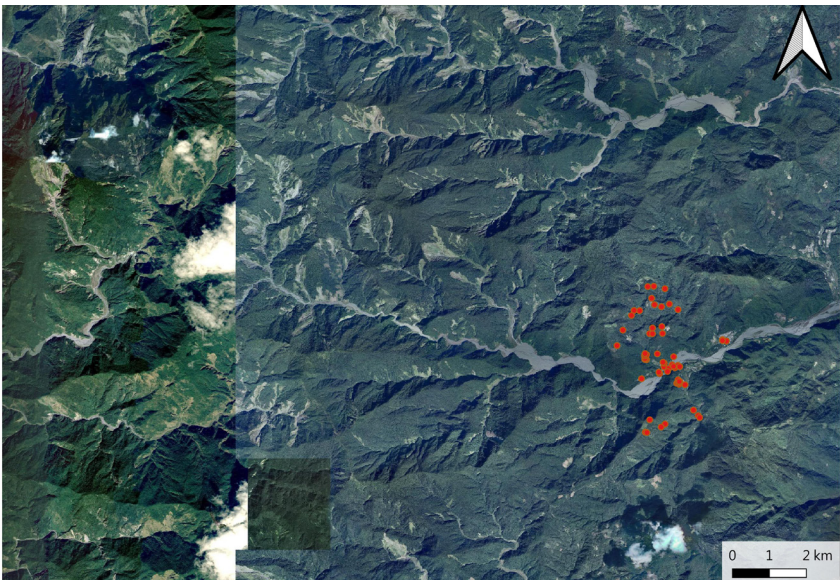


圖 6 八里芬愛部落（李昀融以 QGIS 繪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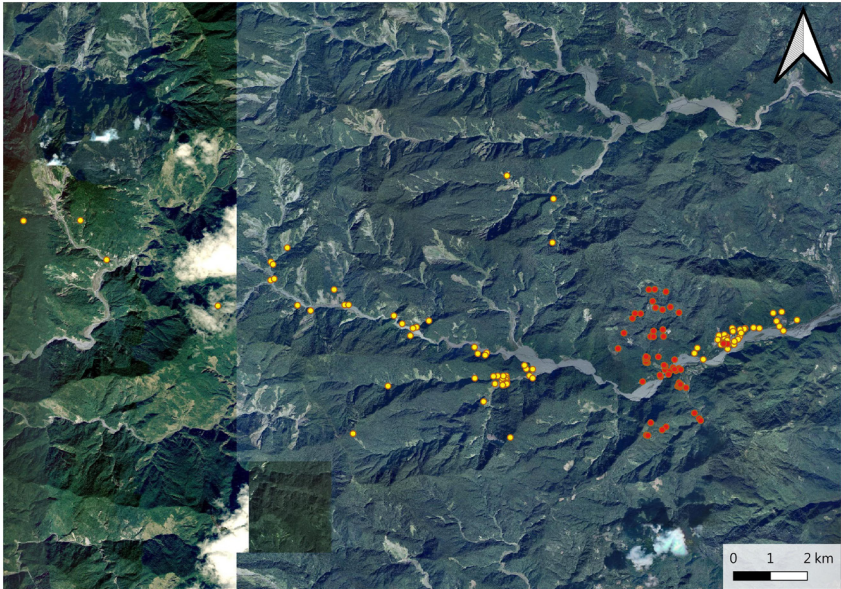


圖 7 土坂「村」傳統領域（李昀融以 QGIS 繪製）

經由繪製傳統地名圖，東大人社實踐中心企圖透過 GIS 記錄在地居民對於土地使用的多樣模式，並以 StoryMaps（圖 8）呈現，增進在地知識的可近性，建構文化傳承、教育與產業發展的素材。然而，若以上述 Tjapalji（有紅眼睛巴里）地名為例，可知各家族對於事件的「真實」有著不同理解。為避免開放式資料呈現後造成家族間的衝突，東大人社實踐中心於 StoryMaps 平台上選擇以土坂「村」為主體，講述過去「居民」如何因著 Palji 的神力與他者（卑南族）產生關聯，藉此將焦點置於「族群」而非「家族」。此外，東大人社實踐中心透過 GIS，一方面深化或屏蔽特定空間的資訊內容時，雖嘗試趨近在地社群因空間與時間所編織出的多重階序性與神聖性，積極於地圖中標記部落祭壇的「正確」位置，但卻選擇不完整呈現祭壇所衍伸的祭祀權力與經語內容，避免多重「真實」所引發的衝突，減緩地圖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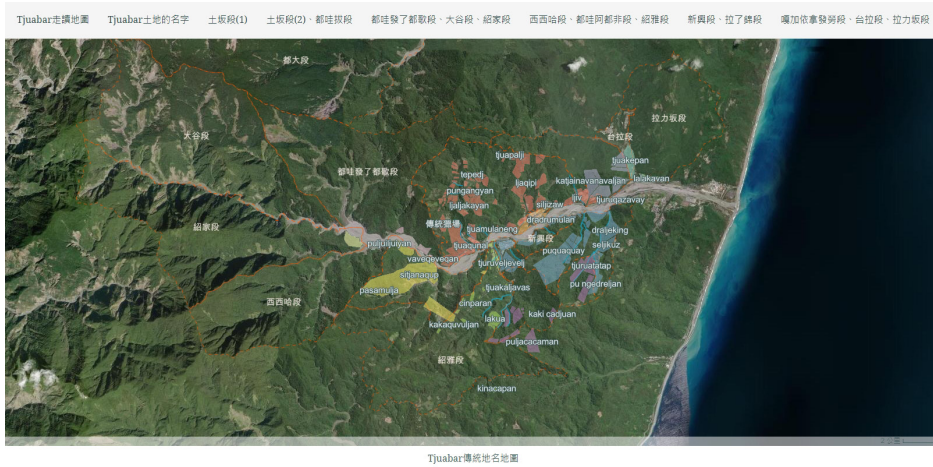


圖 8 「Tjuabar 土地的名字」StoryMaps (李昀融以 ArcGIS StoryMaps 繪製)

滿足在地居民傳承文化、延續祭儀實踐目的之外，為建構傳統生態知識、災害防治、里山倡議與永續發展等議題的討論，東大人社實踐中心致力於以地圖體現文化與自然所共構的在地生活模式。以 Lalakavan (替代道路之意，部落稱作「穿山」) 之地為例，為避免受天然災害所困，在地居民透過傳統地名記憶「繞道」之處，於切繞點設置祭壇標示，更藉由實踐狩獵持續更新與觀察如何沿著獸徑（動物的足跡）避開無法通行之處，並依據傳統禁忌在左手臂綁上芒草（驅邪，並以此為戒保持安靜）快速通過。此舉在傳統知識的範疇中表示遵循禁忌，在科學的立場則是減少音波向上傳遞的效應，避免間接導致土石掉落。經由繪製傳統地名圖，並著重於人與環境的互動模式，東大人社實踐中心一方面企圖體現在地族人在面臨豪雨、山難等情境時如何能夠有效地掌握地方環境狀態，並透過空間描繪傳統運用山林資源的在地知識，強化當代防救災的社區韌性，另一方面刻畫「空間為基礎的社群認知」，嘗試避開可能造成糾紛的時間論述。

七、地圖如何驅動社會實踐？

儘管各家族隨著婚配、遷村與瘟疫等歷史事件，而生成對於空間的不同詮釋，並因著共通的文化特質導致競合關係，但坐落於此空間中的植被、河川與地質，與在地居民日常生活所形塑而成的地景並無顯著差異。如何由共享的自然地景突顯既相同卻又異質的文化認同，是由繪製地圖刻畫過去、理解當下，並邁向未來的重要在地課題。於繪製地圖的過程中，長輩們多半表示若非其身體狀況已大不如前，期盼有朝一日仍能再次踏上這些充滿回憶的土地，並指出東大人社實踐中心所導入的 GIS 技術，彌補智慧型手機太晚發明的遺憾。為使繪製地圖不僅止於為學術討論與文化傳承累積素材，東大人社實踐中心嘗試推動「行動——知識——產出」之間可循環的社會實踐方案，於持續討論或走動的過程中，促進與體現地圖的動態性。因此，東大人社實踐中心於 2022 年 10 月 30 日以「semusu tua pinakazuan —— 循跡」（semusu：追溯，tua：介詞，pinakazuan：去過的地方）為主題舉辦工作坊，除了向在地居民展現階段性成果，並嘗試促進更多在地異質性的對話，企圖共同思考「地圖」的多元可能；更希望透過記錄移動軌跡、空拍機以及 GIS 等實作教學，於共同規劃後期社區走讀活動的同時，發掘未來行動的潛在參與者。

相較於以傳統領袖家族為出發點啟動繪製地圖行動，東大人社實踐中心辦理循跡工作坊時，則是以土坂社區發展協會為主要合作對象，嘗試從當代公共性的立場吸納更多元的參與者。然而，這並不代表此活動忽略傳統領袖的重要性。於先前多方交涉的基礎上，東大人社實踐中心不僅發送正式的邀請卡，請傳統領袖蒞臨指導，同時也將目光投射於在地教育、文史、產業與學術工作者，積極地探索不同視角對於傳統地名圖的理解與期盼。由於循

跡工作坊的目的之一為「發掘未來行動的潛在參與者」，東大人社實踐中心於活動正式舉辦前，便嘗試由協力者廣邀其家族的年輕成員一同參與。之所以鎖定年輕成員為目標的原因有二：其一是因生計活動的轉變，若非舉辦如「社區走讀」這般的特定活動，青年較無機會深度地走訪、認識承載豐富記憶的山林空間；其二是因移動軌跡記錄、空拍機以及 GIS 等實作教學與使用仍需一定程度的數位知識與技術，且由青年學習後將可於未來各家族固定辦理的尋根活動進行記錄，進而由各社群自主深化東大人社實踐中心所建構的基礎圖資。最終當日到場的參與者包含國小教師、生態旅遊從業者、文史工作者、旅外青年、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兼部落主席、族語推廣人員、傳統領袖家臣，以及 Saljingusan 宗家領袖等致力於不同社區工作面向的在地居民。

以地圖為媒介推行社會實踐的企圖吸引了在地國小教師、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公部門人員，以及對於神話傳說與當代科技有興趣之在地居民共同參與工作坊，逐步趨近以「村」為尺度的社會實踐；但當日參與活動的傳統領袖家族仍以 Saljingusan 與 Patjalinuk 成員為主，使該行動尚未充分滿足傳統公共性應有的面貌。因此，如何藉著地圖與走讀促成「編織異質性」，成為東大人社實踐中心期盼透過辦理循跡工作坊理解的問題之一。即是，經由匯集多元參與者共同檢視地圖的行動，不僅是與在地居民分享過去已完成的階段性成果，更期盼於互動過程中發掘後續行動的可能樣貌。藉由理解不同家族對於繪製地圖參與度的差異，可發現除了受工作坊舉辦時間（包括上班與休假時間規劃有異，不同基督教派各有其所屬的敬拜讚美時段等）的影響外，更牽涉到該家族與現居土地間的關係。就 Saljingusan 與 Patjalinuk 而言，記錄與走訪傳統地名，足以證實其家族已居住於此領域居住上百

年之久。然而，Ladan 家族則受到近代的遷移歷程影響，相較於透過 GIS 於先佔權的脈絡中鞏固其「定居」於土地所生成的階序性與神聖性，該家族更重視由舊古樓移動至現居地的「移動」路徑，以及定居後如何延續過去在舊古樓部落所形成的社會關係與互動。

為喚起眾人對於傳統地名圖的重視，參與循跡工作坊的青年以個人旅外求學的經驗指出，數位地圖將成為未來學習文化的重要管道；而中壯年的居民更進一步提醒與會者，當代族人已逐漸遺忘由祖先所積累的在地知識，隨著耆老的凋零，文化斷層也將逐漸加劇。因此，與會的長者認為應先針對舊部落與各祭壇進行走讀，積極保存由土地所維繫的階序關係與傳統祭儀。為了強化分別重視「定居」與「移動」的不同家族與「地圖」之連結，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提議，儘管透過 GIS 記錄與認識舊部落空間和重要祭壇，可遏止傳統文化的消逝，但若要促進在地知識的實踐，應以當代社區空間為核心，逐步由聯外的鄉道、現居地周邊，以及通往農耕地的產業道路，逐漸拉近當代生活與傳統知識間的關係。此外，雖然投入地圖繪製的在地行動者鼓勵社區居民參與由外部單位規劃的走讀活動，但也叮嚀需持續遵守土地的階序性與神聖性（例如部分祭壇女性不宜靠近），並注意國家治理所形塑的土地私有化制度（規劃走讀前須先請示地主），謹慎面對走訪神聖空間（祭壇）與日常（田園）的實踐行動。

藉由剖析工作坊中的討論，可看出不同生活背景與年齡層的民眾產生意見紛歧。年紀較長者期待推動充滿懷舊感、以回到舊部落為主軸的尋根活動，而年輕一輩則期待藉由知識採集深化在地人文與自然地景之理解。由於當代祭儀實踐的正當性仍奠基於傳統領域所有權之認知，無論是各家族每年固定舉辦的尋根活

動，抑或是與東大人社實踐中心共同繪製地圖，皆突顯長者極為注重與過往生活空間關係的維繫。排灣階序與土地的緊密關係，使得舊部落雖被劃歸為非日常空間，但該區域所承載的祖先遷居與開墾記憶，仍是當代傳統領袖家族之所以擁有在收穫祭時向族人收取貢品、代表部落舉辦祭儀的權力依據，藉此滿足排灣社群依循傳統強化行動的延續性，成為接續日常的重要空間。然而，即便「維繫過去與土地的關係」對於重視祭儀的領袖家族與部落耆老格外重要，但卻因舊部落的範圍寬廣，且距離極為遙遠，對走讀活動而言較難操作，也不容易發展祭儀之外的多元可能性，因此青年們較著重於藉由地圖發展社區觀光、文化教育的潛力。為了回應不同立場對於文化傳承與創新運用的期許，東大人社實踐中心秉持「增加可近性」為繪製地圖的目標，由鄰近當代居住空間的地點啟動走讀活動的同時，藉由衛星定位與影音記錄，保留長者對於祭儀與歷史的詮釋，藉此奠定傳統文化的未來實踐基礎。

綜上所論，「行動——知識——產出」之間可循環的社會實踐方案，即是以繪製地圖（行動）描繪在地文化（知識），並以 GIS 地圖（產出）為基礎，驅動更多異質參與者加入討論，或實際走訪（行動）傳統地名之所在，且進一步透過衛星定位、環境拍攝以及錄製環境音等方法深化空間與時間的輪廓（知識），企圖以數位與紙本地圖（產出）觸發未來文化傳承、教育與產業發展（行動）的契機，持續積累更多元的知識與產出。藉由繪製傳統地名圖與規劃走讀工作坊，東大人社實踐中心嘗試釐清複雜的社會文化與時代背景如何造就不同家族勢力，以及不同身分與年齡層對於當代共同生活的土地所積累的多樣知識之理解，藉此探究如何策略性地以行動（繪製地圖）串聯各方勢力所共同重視的尋根活動，並進一步透過更具可近性的產出發展具延續性的實

踐方案，進而舒緩內部衝突的同時匯集多方動能，以滿足「編織在地異質性」的意圖。同時，藉由繪製地圖推動富含傳統價值的知識與行動，東大人社實踐中心促使文化實踐與在地知識得以體現於兼具傳統及創新的媒介之中，進而囊括多元真實、建構貼近地方多重公共性的互動模式。

八、代結論

由於東大人社實踐中心與土坂居民的繪製地圖工作仍處於進行式，目前尚未有足夠的素材由社區居民的視角探討地圖做（do）了什麼，僅可聚焦於地圖的特殊性如何驅使東大人社實踐中心推動社會實踐。因此，本文所檢視的多重行動者除了東大人社實踐中心，以及來自不同部落，但共居於土坂村的社群之外，更包含具有能動性、影響實踐行動的「地圖」。傳統地圖學藉由傳播模式（communication model）的視覺化（visualization）理念，視地圖為體現真實的工具。然而，藉由 Harley 運用 Foucault 和 Derrida 對於權力與修辭的論述所提出的批判地圖學，重新審視許多在權力不均等條件下所生產的歐洲地圖，可發現地圖沉默特性導致地方的抹滅（Cosgrove, 2008）。在地圖權力去中心的論述框架下，林怡先（2012）指出現今的地圖與製圖行動已展現更多地方感，並藉由地圖民主化推動文化轉向（cultural turn），促使繪製地圖成為文化及社會的實踐象徵。倘若地圖如同 Harley 所言，是與其他社會產物交織而成的產物，製作地圖的過程與其依循的脈絡都持續被權力關係所影響，因而本文透過排灣族土坂村的案例，嘗試論證在重視階序的社會文化背景下，權力是地圖趨近真實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 GIS 不僅只是工具、介面，更構建與體

現不同行動者的多元知識與權力樣態。

如同 Klinghoffer (2006) 將地圖視為「權力投影」(power projection)，排灣族群對於空間真實面貌的認知必須奠定於其階序體系之上。階級體系、居住空間與宗教信仰的相互交織，使得土坂村具有神聖性與階序性的人地關係充滿張力。當東大人社實踐中心嘗試觸碰具有神聖性與階序性的知識體系時，建構知識的重點便不只是確保內容的正確性，更要妥善處理建構知識的方法如何滿足 kakudan 對於權力義務的規範，避免與空間相連的知識詮釋、建構與使用脫離既有脈絡。在地圖中所反映的權力關係下，東大人社實踐中心不僅希望透過局內人的視角來理解繪製地圖時可能引發的矛盾，更希望以局外人的身分，一方面運用學術討論和文化傳承作為媒介，來調和各家族之間的競爭；另一方面，則希望藉由這種競爭關係，進一步促進各家族對社會實踐的積極參與。因此，土坂村傳統地名圖的產製過程體現了 Harley (1989) 所論述之權力如何表現 (on) 在繪圖上，以及權力如何與 (with) 繪製一同運行。同時，數位媒介所具備的彈性 (呈現或遮蔽的選擇)，使被體現、或被忽略的事物描繪了土坂村不同社群對於空間的多樣詮釋，並突顯地圖如何將社會文化置入空間、建構秩序和知識，使其具備「興趣選擇 (interested selectivity)」之特質 (Pickles, 2004; Wood, 2010)。

儘管批判地圖學所倡議的地圖民主化的去中心在某個層面上嘗試修補內外權力不均等的中心與邊陲關係，但當地圖被用來刻畫故事的時間軸線及其與空間的關係時，製圖工作更應謹慎檢視製圖過程，以及地圖所譜出的背景和敘事如何於邊陲社群中重新建構權力不均的差異關係。透過後表徵地圖學的觀點，本文以於土坂村繪製地圖的過程，嘗試理解地圖如何具象化故事所描繪的

時空背景，並藉由排灣族階序的時間性與空間性，嘗試了解在地認知的真實具有何種樣貌，以及真實性對於製圖具有何種限制，促使地圖不僅是符號的表達，更成為記憶與文化的容器（Caquard and Cartwright, 2014）。雖然將原住民傳統口頭表達形式轉化為西方製圖視覺化的過程中，難以讓原住民空間觀點跳脫西方技術和方法的從屬，而飽受批評（Louis et al., 2012），但從積極面而論，地圖的民主化確實有助於原住民族重新掌握土地的所有權。有別於過去缺乏製圖技術的社會，在殖民者的壓迫與侵略下，導致其對於空間的掌握受到強權以命名的方式剝奪所有權。批判地圖學雖難以抹除地圖中的權力關係，但後表徵地圖學提供了不同於過去「知識——權力」的封閉與集中性，並聚焦於製圖實踐的「知識——權力」如何具有開放和協議的動態特質，進而將過去由上而下的「地圖即真理（maps as truth）」轉換為由下而上的「地圖即實踐（maps as practices）」（Kitchin and Dodge, 2007; Sui et al., 2013）。

參考書目

A. 中文文獻

林怡先，2012，〈地圖學：一種社會及文化的實踐〉。《地圖：中華民國地圖學會會刊》22(2)：1-17。

周睦怡、陳東升，2019，〈大學社區伙伴研究——社會創新在地實踐〉。《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20(3)：7-14。

周睦怡、熊慧嵐、陳東升，2018，〈在地社會創新網絡：以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在地實作為例〉。《台灣政治學刊》22(2)：147-202。

陳東升，2013，〈發刊詞〉。《HISP 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電子報》1。檢自：<https://www.hisp.ntu.edu.tw/news/epapers/9/articles/23>

B. 外文文獻

- Acciaioli, Greg. 2009. "Distinguishing Hierarchy and Precedence: Comparing Status Distinctions in South Asia and the Austronesian World,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South Sulawesi." pp.51-90 in *Precedence: Social Differentiation in the Austronesian World*, edited by Michael P. Vischer. Canberra: ANU Press.
- Briggs, John. 2013. "Indigenous Knowledge: A False Dawn for Development Theory and Practice?" *Progress in Development Studies* 13(3): 231-243.
- Blakemore, M. J. and J. B. Harley. 1980. "Cultural Meaning: The Iconography of Maps." *Cartographica* 17(4): 76-86.
- Claval, Paul. 1980. *Epistemology and the History of Geographical Thought*. London: Edward Arnold Publishers.
- Clifford, James. 2013. *Returns: Becoming Indigenou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aquard, Sébastien, and William Cartwright. 2014. "Narrative Cartography: From Mapping Stories to the Narrative of Maps and Mapping." *The Cartographic Journal* 51(2): 101-106.
- Corner, James. 1999. "The Agency of Mapping: Speculation, Critique and Invention." pp.213-252 in *Mappings*, edited by Denis Cosgrove. London: Reaktion Books.
- Cosgrove, Denis. 2008. "Cultural Cartography: Maps and Mapping in Cultural Geography." *Annales de Géographie* 660-661: 159-178.
- Forth, Gregory. 2009. "A Tale of Two Villages: Hierarchy and Precedence in Keo Dual Organization(flores, Indonesia)." pp.191-208 in *Precedence: Social Differentiation in the Austronesian World*, edited by Michael P. Vischer. Canberra: ANU Press.
- Fox, James. 1994. "Reflections on 'Hierarchy' and 'Precedence'." pp.87-108

in *Transformations of Hierarchy: Structure, History and Horizon in the Austronesian World*, edited by Margaret Jolly and Mark S. Mosko. Devon: Harwood Academic Publishers.

Fox, James. 2004. "Austronesian Societies and Their Transformations." pp.229-244 in *The Austronesians: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edited by James J. Fox, Peter Bellwood and Darrell Tryon. Canberra: ANU Press.

Harley, John. B. 1989. "Deconstructing the Map." *Cartographica* 26(2): 1-20.

Harley, John. B. 1990. "Cartography, Ethics and Social Theory." *Cartographica* 27(2): 1-23.

Kitchin, Rob, and Martin Dodge. 2007. "Rethinking Maps."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31(3): 331-344.

Kitchin, Rob. 2010. "Post-Representational Cartography." *Lo Squaderno* 15: 7-12.

Klinghoffer, Arthur Jay. 2006. *The Power of Projections: How Maps Reflect Global Politics and History*. London: Praeger.

Lewis, E. Douglas. 2006. "Origin Structures and Precedence in the Social Orders of Tana 'Ai and Sikka." pp.157-178 in *Origins, Ancestry and Alliance: Explorations in Austronesian Ethnography*, edited by James J. Fox and Clifford Sather. Canberra: ANU Press.

Lewis, E. Douglas. 2016. "Precedence and Hierarchy: Mediations on an Unanswered Ethnological Question." pp.51-76 in *Parts and Wholes: Essays on Social Morphology, Cosmology, and Exchange in Honour of J.D.M. Platenkamp*, edited by Laila Prager, Michael Prager, and Guido Sprenger. Hamburg: Lit Verlag.

Louis, Renee Pualani, Jay T. Johnson and Albertus Hadi Pramono. 2012. "Introduction: Indigenous Cartographies and Counter-Mapping." *Cartographica* 47(2): 77-79.

- Orford, Scott. 2005. "Cartography and Visualization." pp.189-205 in *Questioning Geography: Fundamental Debates*, edited by Noel Castree, Alisdair Rogers, and Douglas Sherman. New York: Wiley-Blackwell.
- Perkins, Chris. 2003. "Cartography: mapping theory."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7(3): 341-351.
- Perkins, Chris. 2004. "Cartography-Culture of Mappings: Power in Practice."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8(3): 381-391.
- Perkins, Chris. 2008. "Culture of Map Use." *The Cartographic journal* 45(2): 150-158.
- Pickles, John. 2004. *A History of Spaces: Cartographic Reason, Mapping, and the Geo-Coded World*. New York: Routledge.
- Sui, Daniel, Sarah Elwood, and Michael Goodchild ed. 2013. *Crowdsourcing Geographic Knowledge: Volunteere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VGI) in Theory and Practice*. Singapore: Springer.
- Sletto, Bjørn, et al. 2021. "Walking, Knowing, and the Limits of the Map: Performing Participatory Cartographies in Indigenous Landscapes." *Cultural Geographies* 28(4): 611-627.
- Wood, Denis. 1992. *The Power of Maps*.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 Wood, Denis. 2010. *Rethinking the Power of Maps*.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 Wood, Denis, and John Fels. 2008. *The Natures of Maps: Cartographic Constructions of the Natural Worl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ontending with Time and Space: Mapping the Traditional Landscape of Tjuabar Village

Hsiang-Wei Hsiao*

Abstract

Mapping is both a depiction of real geographical spaces and a medium for constructing the perceived “reality” within specific socio-cultural contexts, portraying aspects of knowledge and power. Brian Harley advocates for critical cartography as a way to break free from the traditional perspective of maps as neutral outcomes of rationality and science. Harley points out that maps are both products of power and tools for producing power; they reinforce the power and interests of minority groups. To avoid reducing maps to textual fields dominated by specific interests and power, this study starts from the socio-cultural dimension of maps emphasized by Harley (1989). Based on a collaborative project by a university and the Paiwan community to map traditional place names, this study reflects on how Foucault’s idea that “power is everywhere, not because it embraces everything, but because it comes from everywhere” affects the democratization of maps hoped for by Harley (1990). Furthermo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t-representational cartography, this study points out how the university responds to the traditional view that “maps must embody the power of specific families in the community to construct reality” when dealing with the hierarchy and spatial relationships of the Paiwan community. It deconstructs the diverse power conflicts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locality in the contemporary context, actively constructing a “real” map that fits the local community’s perception.

Keywords: Paiwan, Mapping, Social Practice, Critical Cartography, Post-Representational Cartography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ublic and Cultural Affairs, National Taitung University.
E-mail: hhwei@nttu.edu.tw